美籍华人把选票投给了谁?

□ 陈洋

旧金山唐人街一家商店用废纸盒封挡门窗,以应对大选可能产生的波动

中国,移民美国人数最多的国家

据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的统计数据,中国(包含港澳台地区)在 2018 年取代墨西哥成为移民美国人数最多的国家。1980 到 2018 年间,美国的中国移民人口从 36.6 万人增长至 245.5 万人,其中约半数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二者均为“蓝州(注:指民主党占有优势的州)”。

从选票数量及增长速度来看,华裔应该是美国大选中不容忽视的一大族裔。然而长期以来,相比拉美裔和非洲裔等,华裔选民的大选参与度存在明显差距,也没能得到两党足够的关注。

今年的大选表现出了一种不同的趋势。2020 年 9 月 15 日,AAPI Data 等发布了一份名为“2020 亚裔美国选民投票调查”的报告,发现 47%的受访华裔选民对本届大选有更高的投票热情,经济、医疗、教育和种族歧视是他们最为关注的话题。同时,有 41%的受访华裔表示没有明确的党派偏好,而偏向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则分占 38%和 16%,至于总统候选人,拜登和特朗普的得票率分别为 56%和 20%。

当然,一份样本有限的统计数据不足以完全展现华裔族群的深度和多样性。随着 2020 年美国大选创下了自 1900 年以来最高的投票率(66.8%),以及拜登和特朗普分别成为美国历史上获得普选票数第一和第二的总统候选人,两人无比接近的得票率也让美国社会的分化暴露无遗。

这种分化同样存在于华裔族群内部。这背后既有美国多元化社会的共性,比如不同教育背景、收入水平、既往经历、职业阶层等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的投射;也反映出华裔社区独特的族群差异,暴露出一代和二代移民间的代际沟壑,以及在文化、历史、价值观等层面的差异。

大选投票是一次自由的政见表达,即便无法互相说服,也带来了认知他者和自我的契机。以下,是三位美籍华裔的自述,属于他们的投票故事。

投给拜登:参与基层投票站工作的丹姐

1988 年来美国留学前,我在北京做脑外科医生,主攻科研。我顺利申请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研究岗位,并在那里遇到了我后来的美籍丈夫。1990 年代初结婚后,我成为美国公民,之后在美国南方生活了 12 年。如今,我定居芝加哥,在一所生物公司负责美国和亚洲区业务。

刚来美国时,华人还很少。三十多年过去了,华人虽然越来越多,但大多数对于社会政治活动不太积极。这背后也有客观原因。哪怕是我这样,和美国人组建家庭、在这边待了大半辈子的人,也时常能体会到种族差异带来的无形隔阂。就像水和油,你可以临时把它们搅匀,但最终还是会分开。作为少数族裔,越不去努力融入,就越容易被这个多元社会所孤立。所以,我一直对各种志愿活动非常热心,也会动员华人朋友一起参与。

2020 年,我第七次投票选总统,并首次参与基层投票站工作。我非常不喜欢特朗普。首先,他满嘴谎言,张口就来;其次,他非常自私,自他执政以来,美国退出的国际组织或者停止执行的国际协议达到十余个,其中许多都是战后由美国创建或发起的;第三,他非常不尊重人,尤其是对非白人族裔、女性不尊重……所以我非常期待这次能把他选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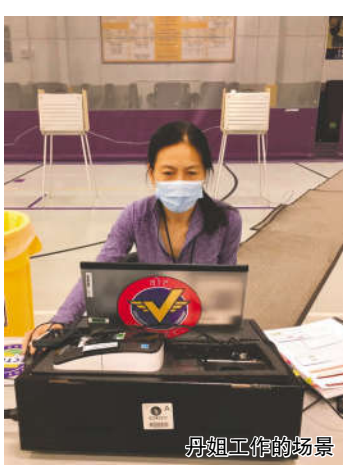
按照规定,只要没被判过重罪,并能保证参加培训,本地注册选民都能申请基层投票站的工作。因为大选日是工作日,往年投票站的岗位大多由退休人员承担。今年由于疫情严重,很多退休人员出于健康担忧会选择居家。一旦选举站工作人员不足,就可能导致选民排队时间延长,影响大家的投票热情。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早早就提交申请投票站工作。我是医生出身,知道如何防范疫情,保护自己。

11 月 3 日是正式投票日,为了保证当天能专心工作,我提前邮寄了选票,并向公司请了假。3 日一早,按照规定,我 5 点就到达了场地。我们必须在一个小时内严格按照选举流程完成所有步骤,节奏十分紧凑。到 6 点正式开门,一下就涌进来二三十个投票者,投票早高峰开始了。

一般投票的高峰期分为三个时段:早上上班前、中午午饭时间和下午下班前后。投票的基本流程是:选民需要先到接待台提供有效身份证,或者银行账单、水电费账单等可以证明当前住址的单据;经核实并签名后,选民可选择领取纸质选票或者电子投票卡;领取纸质选票的选民前往带有隔板的投票亭填写,领取电子投票卡的则前往投票机通过触屏填写;纸质选票填好后需要去扫描仪扫描投票结果;一切无误后,投完离开。

我们投票站 19:00 关门。但做完一系列收尾工作,我到家时已经是晚上 9 点多了。虽然很累,但我更庆幸自己没出错。对于结果,我倒是不怎么担心,伊利诺伊州肯定是“深蓝”。

我女儿 22 岁,今年是她第二次参加大选投票。她原本可以回家投的,但她选择了留在大学所在的俄亥俄州,因为后者属于关键摇摆州。为此,她特地更换了证件,把地址由家里改成了学校。虽然过程挺麻烦,但她很高兴自己的一票能去往最需要的地方。


丹姐工作的场景

我自己七届大选选票都投给了民主党,因为我觉得民主党更关注穷人。我的白人丈夫连续两届投给了特朗普。他是一名医生,从“奥巴马医保”法案推出后,他都投了共和党。虽然政见不同,但我们尊重对方的选择。

投给特朗普:“宁愿选一个疯子”的黎叔

我是 1992 年来的美国。那之前,我在北京一所三甲医院做医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值国内一波出国留学潮,为了更好地发展,我申请了一家外国药厂的奖学金项目,过五关斩六将,如愿拿到了去洛杉矶学习的机会。办了停薪留职后,我揣着几乎全部家产独自来到洛杉矶。当时,我的奖学金是每月 1800 美金,相对宽裕的财务状况让我得以更专注地投入到课题研究中。

从访问学者到住院医生再到拥有行医执照的正式医生,从 J1 签证到 H1 签证再到绿卡。到美国的第十年,我拿到公民资格,成了第一代移民美国的华人。

虽然 2002 年起我就有投票资格了,但 2016 年前,我从未行使过这项权利。一方面是因为加州是民主党的大本营,无论我投谁都不会影响结果。另一方面,此前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政策主张上并没有水火不容,民主党也不像现在这样,力推平权法案、全民健保以及大麻合法化等在我看来太过激进的政策。

总体来看,左右我投票的主要是两方面:我华裔的身份;候选人推行的政策。2016 年的大选,我很不喜欢希拉里。早在奥巴马执政时期,还是国务卿的希拉里就表现出对中国的明显“敌意”,比如,她当时主推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囊括了一众太平洋沿岸国家,就是不包括中国。

另外,我对民主党的一些政治主张也并不认同。我的思想相对保守,比如在我看来,民主党在同性恋议题上的态度就太过激进。

相反,我对当年首次登上政治舞台的特朗普印象深刻。之前,无论驴象两党谁当选,都是同一个圈子里的人轮流坐庄,特朗普算是这么多年来美国票选出来的第一个圈外候选人,有种草根民主的感觉。

他关于美国国内的一些政治主张也跟我比较接近,比如限制非法移民。当然,我也是外来移民,但我是合法合规获得的公民资格,为美国社会做出了贡献,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提升了地位。加州为什么多次遭遇破产危机,我认为跟非法移民有很大关系。加州很多政策都是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来制定和执行的,但以美国现在的条件,社会承受能力有限。

当然,特朗普的一些政策也损害到我的利益。以他的税改为例,加州房价高,税改后,我每年要多交 15000 到 20000 美金的税款。另外,疫情期间,他“China Virus(中国病毒)”的说法也让我非常不高兴。

所以,我未必有多么支持特朗普。但在他和拜登之间,我只能矮子里面拔高个,宁愿选一个疯子,也不选一个傻子,因为疯子能干成事,而傻子啥事也干不成。

投给拜登:耶鲁大学大二学生多多

我父母上世纪 80 年代来美国。妈妈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到美国后为了找工作,转学了计算机,现在就职于一家科技企业。爸爸刚来美国时在可口可乐的一家工厂做会计,后来开始经营自己的生意。

我从小在芝加哥附近长大,今年第一次参加大选投票。除了 15 岁的弟弟没有达到法定投票年龄,我们全家都把选票投给了拜登,连在香港工作的姐姐也提前邮寄回选票。

和其他族群一样,不同的成长经历、经济状况和社会阶层使得华裔群体内部政治观点各异。问题是,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没有在制定政策时给予华裔群体足够的关注。

虽然近年来,华裔移民主要是来自科技、生物、医疗等领域的高端人才,但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话语权上,华裔依然面临明显的“竹子天花板”。比如,我虽然是第二代移民,从小就生长在美国,但依然常常被视作“外来者”。

很多时候,华裔所处的这种状况既是原因,也是结果。我小时候,父母就有投票资格,但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投票热情。因为在他们眼中,要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不能寄望于某个党派的某个总统当选,最终还得靠自己的努力。我觉得这也代表很多上一代华裔美国人的想法。

进入耶鲁大学后,我选择了民族、种族和迁徙专业。这一专业能同时满足我对历史、教育和法律的兴趣。我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对家庭和族裔的责任,要担起这份责任,就必须有所作为,去改变不公的状态,那么参与政治议题就是其中的一条路径。

我们一家都倾向于民主党,我身边也有华裔朋友跟父母的政治观点不同。有些华裔父母反对民主党,是因为不赞同后者倡导的社会福利政策。我能理解不同代际间政见不同的原因,每个人都会基于自己既往的经历做出决定。

对于这次大选波折的选情,我并没有特别紧张。尽管我非常希望总统不再是那个满嘴种族言论的特朗普,可我知道,总统无法替你解决眼前的所有问题,你要明白接下来的每一天你能做什么,要如何为改变而努力。

(选载自《南方人物周刊》)